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天皇与日本国命

裕仁天皇引领的日本军国之路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 (David Bergamini) 著 王纪卿 译

上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天皇与日本国命

裕仁天皇引领的日本军国之路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 (David Bergamini) 著 王纪卿 译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皇与日本国命 /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著 ; 王纪卿译 .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39-1206-8

I. ①天… II. ①戴… ②王… III. ①日本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① K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1061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01-2016-5505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Copyright © 1971 by David Bergamin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天皇与日本国命

TIANHUANG YU RIBEN GUOMING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 (David Bergamini)
译 者	王纪卿
责任编辑	李保华
监 制	于向勇 马占国
特约策划	秦 青 赵 辉
特约编辑	王 蕾
营销编辑	刘晓晨 罗 昕
版权支持	辛 艳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9778 59417747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95mm 1/16
印 张	62
字 数	12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1206-8
定 价	108.00元 (全二册)

引言

手头这部著作重新考察了我在司法职位上探讨过的一个历史领域。我曾先后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席法官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法官，那时由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十一名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特别法庭，自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开设于东京，而我是首席法官。对那两年半的审讯工作，连日本本土媒体都因其公正而加以赞扬；审讯之后，特别法庭将二十五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或监禁，其罪名是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并对通常的战争罪行，即其部属犯下的暴行承担责任。

当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手稿送到我的邮箱时，我欣然将它拿到手里。该稿作者兼有记者和学者的资质，对原始文献进行过多年研究，因此，我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现在读了他的劳动成果，我发现自己的期望被超越了。

本书是一个巨大的成果。我很少读到这样的历史著作，能把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史实编撰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话，同时逻辑井然，明了易懂，对历史过程的性质提出具有挑战性的论点。作者坚持将历史视为男男女女的行为，而非处于复杂的社会压力与经济压力下的暗箱操作，这是很新鲜的观点。也许这部著作需要经过若干岁月才能在学者的评价中得到恰当的地位。对讲英语的公众而言，其中的多半信息都是新鲜的，而某些解释肯定会引起争议。然而，我断定本书具有最高的意义，会使西方人对东方历史的看法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本书补充并完成了我曾担任庭长的那个特别法庭所做的裁决。确实，本书证明，法庭的各项判决确实是根据罪证做出的，而且本书提出的罪证比控方提出的罪证更令人信服。这毫不足怪，因为审讯开始于1946年5月3日，距日本投降才过了八个月而已，而作者所使用的大部分原始材料于1960年以前在日本还是无法加以

使用并获得利用。特别法庭的法官曾断定，还有大量的证据未被控方或辩方提出，而检控方或辩护方又未能很快获得这些证据；而且，特别法庭本身也无权按自己的意愿下令调查。

手头这部著作不符合特别法庭在鉴别天皇这一角色时所掌握的事实。贝尔加米尼先生从裕仁廷臣的日记中摘取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细节，认为天皇要对两件事情负责，其一是批准日本在1941年对西方进行攻击，其二是怂恿军方发动这一攻击。我可以对这个观点予以置评而无越权之嫌，因为天皇并没有出席特别法庭受审。

特别法庭采用的是英美审判法。12个世纪以来，这种方式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十分奏效，似乎能够保证获得公正的结果。不过，在英美法学中，提起控诉的权利仅仅属于检控一方。特别法庭的控方起诉了次要的日本领导人，但特意将天皇置于特别法庭的司法权之外。

在庭审开始前，我认为天皇作为一个绝对君主，明显应为批准开战负责，我应本国政府的要求，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我补充说，如果天皇受到控告，我将会取消自己的法官资格，因为这个建议是我提出的。庭审中提出的证据证实了我先验的判断，表明天皇确实批准了战争，因而应对它负责。

到了给被告判刑的时候，天皇角色的问题就成为一件大事了。鉴于被告不过是奉命行事的臣属，鉴于他们的首领逃过了审判，在判刑时就得不得不考虑大可减刑的因素。检控方的证据留下了余地，令人相信天皇是不情愿地批准了战争。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证据，但它在从事鉴定时具有若干价值。

在天皇内大臣木户侯爵的日记中，1941年1月30日的那一篇表明，天皇有些犹豫地批准了战争。这篇日记还表明，天皇之所以犹豫，并非因为热爱和平，而是担心失败，不过这种担忧被海军大臣和海军军令部部长驱散了，他们做出了天皇所说的“完全令人满意的保证”。

1941年的日本首相东条将军，是这次审判中的被告之一。他首先做证，声称他从未违反天皇的意愿行事，后来又回到被告席上，声称他曾竭力奏请天皇批准开战。他这两次的证供恰好印证了木户侯爵的那篇日记。

海军大将冈田，1936年在首相任上险遭军人极端分子暗杀，他提供的证词，大意是说天皇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倘若天皇置身于被告席上，那么冈田的证词定然会被接受为开脱之词，因为它可说明天皇的一般人品。

由于特别法庭无权决定天皇在何种程度上有罪或无罪，这些微小的证据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检方却打开了一扇怀疑的大门，使人们不相信被告有权犯下其受到指控的

罪行。为了避免不公平的判决，我建议对所有被告都不处以极刑，而是将他们监禁在某个艰难的环境里，或监禁于日本以外的若干地方。尽管如此，被告中仍有七名被判处了绞刑。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复审上诉判决时采用的尺度，我不能说这些死刑判决是明显过重了，所以我没有坚持自己的异议，于是既对一些人宣判了死刑，也对另一些人宣判了徒刑。

本书再次使我相信，除了绞死松井石根有可能量刑过重以外，对其他人的判决都未有失公正，而那些被处以绞刑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曾强烈反对一些杀戮和暴行，但是他们的确应该为很少或根本未曾加以制止的肆意杀戮和野蛮暴行负责。关于天皇本人，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政府中，在政治的高层，已经做出了对他不予审判的决定。我应本国政府的要求就天皇问题提供意见，我建议此事应在政治或外交层面进行处理。

若干民主政府结成同盟，付出生命和物资的巨大代价，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然后却让这个政府的最大独裁者留在领袖的位置上，是未免令人感到奇怪的。但裕仁不仅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象征。不论他作为个体是多么罪有应得，但他仍是其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数日本人相信，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割的，必须生死与共。

我在东京担任法官的三十个月中，我常常被证人们对日本天皇的关心与敬畏，为他们在答辩案件时的认真态度和正直感所打动。有时我会自问：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日本在1941年诉诸战争？我在辩护人有力的辩论中听出了许多合理性和减罪的理由，他指出日本是一个九千万人的弹丸小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可耕土地，而又受到外界严厉的贸易约束与限制。我思索着如果美国 and 英国身临其境会做何反应，而两国的人民实际上又会要求政府做何反应。

美英若处在日本1941年的处境下，很可能会诉诸战争。我回想起丹尼尔·韦布斯特在一个世纪前向伦敦律师协会发表的一篇演说，这位著名的美国法学家在此次演说中称赞弹丸之地的英格兰扩张成了一个大帝国，其原话如下：

其晨鼓伴随旭日响起，与时俱进，以英格兰连串而不间断的尚武旋律环绕地球。

扩张并不完全是和平谈判的结果。

直到20世纪为止，发动战争的权利一直是各国行使的主权，除了担心失败以外，没有任何障碍。失败者割地赔款，骑士制度的粗暴法则用于判断国际是非。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致力于协商战争行为的准则，协商国际法的原则，以用于审判发动战争的国家。终于在1928年，六十三个国家签署了《巴黎非战公约》，谴责在非自卫情况下以诉诸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日本是签字国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政府特别通知签约各国：日本是以天皇陛下的名义签约的，而非像其他国家那样以本国人民的名义签署。

《巴黎非战公约》中并未明确规定，若有签约国破坏条约，该签约国的战争领袖应承担个人责任。一些有名望的国际法学家认为，该公约并未强制规定个人责任。然而我不能说，批准这样一份即便在遭到违反时也不会有个人受到惩罚的国际法，是这六十三个国家的徒劳无益之举，其中一些国家是在为其国家利益做了多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签署这份公约的。无论如何，日本在1945年9月2日以裕仁天皇名义签署的投降书中明确承认，同盟国有权以破坏国际法的罪名审讯单个的日本战争领导人。天皇内大臣木户侯爵1945年8月的几篇日记表明，裕仁明白“战争罪犯”包括所有对战争负责的人，甚至可能包括他自己。

简而言之，特别法庭在开庭时的法律立场是：如果说依照《巴黎非战公约》和日本的降书，日本犯有侵略战争罪，那么，其军政和其他方面的战争领导人应负个人的责任。日本所能提出的唯一辩护是“自卫”。特别法庭考虑了这一辩词，然后加以驳回；这个辩词无法成立。日本攻击了泰国、菲律宾自治邦这样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未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总之，日本发动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国家行为，对国家行为而言，惯常的惩罚是赔款或割地；这是一种国家犯罪，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可以认定日本战争领导人和罪犯一样犯有罪行。

在聆讯、辩论两年半后，特别法庭有了这样的认定。我们宽严并举，在面对的二十五个罪案中，发现十八个罪案有充足的减罪理由，于是对被告仅处以徒刑。对另外七个罪案，特别法庭判处了极刑，因为证据表明，被告不仅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而且应对其领导行为负责，这种领导行为纵容了在其他情况下能够做到纪律森严的日本军队在战斗前线之外的区域犯下抢掠、奸淫和屠杀的罪行。

不言而喻，贝尔加米尼先生的观点是，如果不连天皇一起审判，就不该将任何日本领导人处死。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仍然能够对它产生同情。根据贝尔加米尼先生的说法，天皇对于现实有一定程度理论性的、科学性的、与世隔绝的理解。这位作者说，天皇可能并非傀儡，而是其聪明能干的人民的强健而睿智的领袖。不过，

他所在的层面高于他的一些大臣。他似乎是个爱国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人民的福祉行事。在1941年以前的几十年内，他可能就扮演了鹰的角色，并策划了对西方的战争。但我怀疑，假如裕仁在1946年至1948年间坐在被告席上，我对他品格的重视，会超过对日本其他大多数战争领导人的重视。的确，裕仁作为政治家的价值，从他国家今天的地位中显露出来，这个国家在他的统治下，通过使自己成为地球上的第三工业强国，对战争做出反应，并遭到了战败。

一个罪犯，只要提供对同犯不利的证据，或以另外的方式协助法治，总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大处理。裕仁的情况也是如此。他逃脱了起诉的威胁，摆脱了战败的屈辱，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他作为绝对的君主，维护其最高权威，结束了升级为核战争的敌对状态。不错，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日本被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震得摇摇晃晃；但他这么做是冒着某种个人风险的，正如贝尔加米尼先生的叙述表明的那样，看一下他讲述的1945年8月14日至15日夜间在皇宫之内及其附近发生的那些怪事就会知道了。

贝尔加米尼先生举出了一个有力的事例，使人们相信裕仁曾阴谋策划要引导日本去征服亚洲。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天皇值得拯救的那种感觉，就有见利忘义和玩弄阴谋之嫌了。但作者对裕仁的明显钦佩也有这种嫌疑。而经杜鲁门、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这些观点完全不同的政治家一致同意豁免天皇的决定，或许也不例外。

裕仁是日本人，他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海岛世界。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发展。人类学家、诗人、牧师和外交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经过研究，发现日本人的世界具有独特的逻辑和独特的美。如今，贝尔加米尼先生在长期研究第一手文献之后，展示了那个世界的政治层面。他以简明易懂的西方语言来阐述，但他成功地反映了日本人的观点。在掩卷之时，我深信，任何一个在日本皇宫中长大的日本人，都会试图去干裕仁干过的事情，而只有少数人才会干得如此出色。总之，裕仁尝试了战争，差一点取得成功，他比任何日本人都更有资格受益于战败的教训，领导他的人民向新的方向前进。

为了引导读者认识这一点，贝尔加米尼先生对日本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件新鲜事。一方面，他如同冷静而精明的谋士，抛弃了战时对日本人的痛恨；另一方面，他如同狂热而情绪化的粗心人，坚决反对战后为日本人辩解。在贝尔加米尼先生看来，日本人总是有理性的，并且成功地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少得可怜的物质资源，让世界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可爱的父母和孩子，为一种对他们而言充满了温暖和慰藉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它包括铺着草席的地板、热气腾腾的

浴桶、背光的纸糊门窗、小萝卜泡菜和蒸米饭。我在东京的那些岁月里从未尝试过这些日本风味，但贝尔加米尼先生几乎使我为此而后悔。在阅读他的书稿时，我感到自己竟然完全代入了他故事中的那些角色，以至于期待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

贝尔加米尼先生肯定日本的价值和日本的成就，而毫不勉强，所以他必须重新解读日本的历史。他的著作不仅对1945年前后的事件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而且对公元50年以来发生的很多事件提出了新的看法。我发现他的见识有着非凡的一贯性和说服力，而我则只能说：“看官，请读下去。”

威廉·弗勒德·韦布勋爵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作者致读者

“我当然希望日本人得胜，”我说，“日本人干净，中国人脏。日本人工作，中国人乞讨。日本人造机器，而中国人只会破坏机器。”

“你简直是个血腥的纳粹！”那个英国男孩说道。他的话刚出口，我俩便滚在了操场上，我们灰色法兰绒短裤和运动校服沾满了污泥，脑袋磕在一周前日本进行第一次空袭后人们设置的沙袋掩体上。那是1937年10月，我们都是九岁的学生，就读于华中汉口市为白种男孩开设的小型英国学校。这次打架是我在汉口私立小学的第一次，在以后两个月里，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又跟班上其他同学打过几次。我出生在日本，不到一年以前，我父母把我从日本领到了中国。现在日本已经进攻中国，日军正向中国首都南京迅速推进。

将近一年以后，在1938年9月，我和父亲坐在一个山洞口，这个山洞已被中国庐山圣地的那些口念经文、脚踏草鞋的佛教僧侣用作庙宇。庐山位于沿长江从汉口到九江的中段。夏天，这里是西方人的一个度假胜地。父亲和我通过双筒望远镜俯瞰悬崖峭壁，看到五千英尺之外日占区的前线。我们离得那么远，却能看清一个个日本兵，他们正在对一座中国村庄进行报复性的袭击。他们用刺刀挑刺村民，逐家逐户地烧毁村舍。村庄上空浓烟冲天，遮住了烧炭人烧火时冒出的火焰。无论天晴下雨，不管战争和平，在那郁郁葱葱的山麓，那些烧炭人总在劳作。明天又会有新的难民涌到山上，其中大部分是孤儿，幼童身上有刺刀留下的恐怖伤口，只比他们大几岁的姐姐背着他们行走。然后在第二天夜里，占据着山顶的中国游击队又会突袭山下的平原，带回几颗日本兵的人头，挑在竹竿上，举行胜利的游行。

我不再是日本人的同情者。我童年印象中的那些温和、体贴、礼貌、善良的人，如今变了，变得讨厌，变得莫名其妙。在这里，在战场上，日本军人不单是发动战争：他们趾高气扬，扇别人耳光；他们向饥民征粮，向无家可归者征用铺盖，向赤贫者征用铜板；他们强奸小女孩，将孕妇开膛破肚，将婴儿抛到空中，用刺刀将他们接住；除了酷刑拷打下的供词，他们不相信任何真相；除了威胁恫吓，他们不懂行政的艺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我开始把日本人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我父亲的一些朋友将之归咎于著名的“日本人自卑情结”。住在山下街上的一位中国将军认为是日本的领导者有问题。他说日本是由一个不称职的天皇统治着，他意欲征服全世界。我倾向于接受这位将军的解释，因为它简单明了。

1939年初，我们全家和其他西方人一起从庐山疏散了，穿过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防线，乘坐一艘日本轮船前往上海。在沿长江而下的三天航程中，日本的商店只供应面包、奶油、沙丁鱼和咖啡。我发现船上有大量的日式食品，很快我就在厨房里跟厨师和卫兵一起吃上了米饭、酱油和小萝卜泡菜。在战区之外，我惊讶地发现，日本军人仍旧是我记忆中那些快活而体贴的人。他们多数人知道我父亲建造的大规模的圣卢克东京医院。他们似乎由衷地感谢父亲在日本那些致力于建筑业的岁月。

1941年圣诞节过后两天，我再一次跟家人一起来到一座山头——这一次是在菲律宾的度假胜地碧瑶市。我们又成了难民，靠几只手提箱里面的东西过活。我们在当地一所美国学校等待，和另外大约三百名美国人待在一起，等待着被日本人正式俘虏，并宣布为战俘。当地一位日本移民，曾给我父亲当过木匠，来到校长的住宅，我们一家人当时把床垫铺在地板上，权且住宿。他很有礼貌地通知我们：日军终于开来了。我们便集合在学校的一个网球场上去迎接日军。

一辆广播车在两辆军械运输车的护卫下，在暮色苍茫中呼啸而来，然后慢慢停下。轻机枪前后移动，指向我们。一名日本卫理公会的牧师跳下广播车，开始高谈阔论。他宣布，由于日军的英雄主义，一个亚洲人的亚洲终于实现了。我们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俘虏。“请你们把枪交出来。”我们推选的发言人告诉他：我们已经保证我们没有任何枪支。牧师不相信。他威胁说，他会要士兵进行搜查，每搜出一支枪，就枪毙一个人。接着又威胁说，每搜出一支枪就枪毙十个人。最后他宣布：“如果搜出一支枪，把你们统统枪毙！”

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颤抖着站出来，拿出一支空气压缩玩具手枪。他抽泣道：“请不要枪毙妈妈。”军械运输车上的日本士兵哄然大笑。我们其余人放心了。卫理公会

的牧师怒气冲冲地转身而去。我们被塞进一间集体寝室，饥肠辘辘地待了两天，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而日本人在此期间占领了碧瑶市区，并决定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心里记住了一个事实：即便在战区内，日本军人也会感情用事地保留对孩子的几分喜爱。

我的印象是，我们面对的是训话而不是刺刀——这完全不像日军在中国对待俘虏的做法。日本人是不是都是野蛮的，都服从上面下达的命令呢？几天后，我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当时碧瑶市侨民社区的一些中国商店老板被拘禁在与我们毗邻的一座建筑物里。几小时内，看守我们的那批日本军人把一个中国人捆在一根柱子上，当着同胞们的面，把他打得不省人事。我意识到，日本人对亚洲人是一种政策，对待西方人是另外一种政策，而我们则被归类到针对西方的对外政策范围中。

我们最终被安置在一个从前属于美军的哨所里。我们在这里每天只得靠两碗米饭和一份炖蔬菜过活，习惯了群体住宿在每块长六英尺宽三英尺的长方形兵营地板上。一天，一名日本看守来到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建议在集中营内开办一所学校。和大多数被拘押的成年人一样，委员会的成员预料战争不会长久。他们一心要解决活下去的当务之急，无心考虑这个建议。然而那名看守却很执着。他去找了集中营里一个年龄稍大的少年，提出要其帮忙找书。最终他把我们当中的五个孩子装上一辆卡车，用防水帆布把我们盖起来，秘密地开过他自己的警卫室，来到我们战前念书的布伦特学校。

我们发现学校门上贴了封条，上面写着“日本皇军财产，抢劫者枪毙”。我们撕破封条，把教科书装到卡车上运回了集中营。我们意识到生而有之的受教育的权利可能被剥夺，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大多数孩子把这些教科书翻了很多遍。结果，在二十来个被拘禁的中学年龄的孩子当中，仅有一人因为在集中营待了三年而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我们当中的两个人还努力地多学了一个学年。每天跟一群劳工工作五小时之后，我们腹中空空，除了读书，再没力气干别的事情。我记得自己拿着几何书躺在铺位上，和通常一样，在下午进餐前我有些头晕，苦苦思索为什么人们会对教育有狂热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能识文断字，也是这种信仰，驱使我们的看守跟我们合谋去弄书。

1942年有几个月时间，日本人把我的一家和另外十几个战前已是碧瑶注册居民的家庭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因为他们企图让当地的菲律宾人感到生活已恢复常态。在

这几个自由的月份里，我们借了钱，买了食品，有了足够的食物。碧瑶已成为在巴丹负伤的日军的疗养中心。城里到处是军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出家门，只有每周一次到市中心广场露天食品市场的货摊上去购物。每次进城购物，我喜欢搜集日本最高指挥部用英文写就张贴在市场上的告示。我不敢让人看到我公然抄写这些布告，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直到记住上面的语句为止，然后一回到我们居住的那所小房子，我就立即写下来。这些告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显示出日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鸿沟，以及每当日本人试图用英语表达意思时都会表现出来的笨拙。我对下面这份告示记忆尤深：

居住在碧瑶城内及其附近的伊哥洛特人继续放火焚烧或抢劫碧瑶城内及其附近的一些财产。这是不良行为。日本皇军一旦发现有人企图这么干，就会将他们枪毙。

签字：

挚爱你们的

陆军中佐扫守

一年半以后，一天夜里，我坐在集中营营房周边一间茅舍用藤条搭成的门廊里。我们每个人都刚刚收到红十字会给自己寄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战时包裹。我的包裹装着十盒不能当点心吃的香烟。那天下午，我在干日常的杂活时，有权通过栅栏，从日本卫兵室的厨房里把垃圾运出来，我乘机跟一名日本卫兵搭话，此人五官端正，表情诚恳，是来自日本名古屋的技工。我用一盒香烟跟他换两挂香蕉。我先给了他十支香烟，他便悄悄把一挂香蕉塞到我要搬运的一只垃圾罐的底部。现在，当我坐在小小的门廊里，听到远处黑暗中嘘嘘有声。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远离环绕着茅舍的昏暗灯光，在黑暗中碰见了来自名古屋的卫兵，他把一大挂香蕉扔给了我。

“我们已奉命出发。”他说。

“你能跟我一道回男营房吗？”我问道，“我把香烟放在铺位上了。”

“香烟就算了，”他安慰道，“咱们都一样。我在日本有个儿子，他也挨饿。”

我向他表示感谢，问他要去向何处。

“去南部。”他答道。

那可能是指新几内亚，于是我祝他健康。

“不，”他听天由命地说，“我们都会死。除了为天皇而死，没有别的出路。”他

垂下头，短促而拘谨地鞠了一躬，便匆匆向卫兵室走去，以免被人发现他通敌。他声音中透出的哀伤和绝望，在他身后蔓延。我想，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和我们一样痛恨这场战争。他们只是等待着和它同归于尽，等待着服从最后的命令而死去。如果那位卫兵接到了命令，他有可能杀死自己的儿子。我困惑地拉扯一下丁字裤，调整它的位置，那是我身上仅有的衣物，然后用脚趾紧紧夹住脚上那双粗笨的木屐，转而思考如何把香蕉偷运回男营房的问题。

1944年初，东京给我们派来了一名新看守长。他宣称，他正患第三期梅毒，容易发火。他很快便向我们表明，他最喜欢干的事莫过于用棒球棒痛殴别人的脑袋。倘若没有一名日本文官作为观察员派驻我们集中营的话，他很可能已经用棒击杀害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名文官是名将真崎的儿子，那位将军在1936年发动过反对裕仁天皇的叛乱，而在更早的时候反对过“南进”的帝国政策。所谓“南进”政策，就是准备最终夺取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荷兰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夺取美国的菲律宾殖民地。由于其父对抗天皇的旨意，我们的小真崎被拒之于军队的门外，但仰仗其父从前的威望，他知道如何对付军人。他的能力足以对抗我们那位疯狂的看守长，使我们多次免受冲击，而至少有一次幸免于死。

一天，我正在大门附近的军官宿舍区收拾垃圾，听到真崎和看守长争辩，说我们有权享用电灯读书，直到夜间9点半熄灯为止。看守长说，他奉东京之命对我们要严厉，新秩序中没有我们的地位，我们终究不免一死。真崎答辩说，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当然有可能死亡，但如果搞得不好，那么可能在战后的某一天，报应就会到来。接着他严肃地提醒看守长，天皇陛下的名义绝不容许因为在国际交往中的不得体而受到玷污。

这个小真崎，我们的恩人，后来死于美军飞机对日本载重汽车队的轰炸扫射之中。那个车队刚给马尼拉南部一个集中营里被拘禁的六千名西方人运去一批救命的食品。美军1945年在吕宋登陆，切断了这个集中营的食品供应。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得知真崎的家史时，有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那些试图阻止日本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人是非常勇敢的，他们一直斗争到最后一刻。

1944年12月，由于战争形式的变化，我们的集中营通过车队运输迁移到马尼拉。一个半月里，我们靠吃鸡饲料、野草和蜗牛为生。然后令人喜出望外的是，美军第一骑兵团来了。麦克阿瑟从一个不认识的日本人那里得到内幕消息，我们集中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后来告诉我们，那是一条准确的消息。消息说，东京已命令集中营的看守

长处决他们的囚犯，而不是将囚犯交出去。准备处死我们的计划决定在1945年2月5日星期一的早晨执行。2月3日星期六下午，第一骑兵师的坦克冲过了马尼拉北部的沼泽地。他们在黄昏抵达该市。我们被囚于比利比德监狱医院，住在水泥地板上，那是一所阴冷的白色建筑物，百叶窗用波纹铁皮封闭了起来，四周是西班牙古堡生满苔藓的厚围墙。从我们的屋顶上辨认不出坦克两侧的迪士尼卡通徽章究竟是什么图样。它们看上去像日本字。起初只有零星的步枪射击坦克，但接着大街对面的一所建筑物里的日本炮台开火了，我们不得不跑下楼，卧倒在水泥地上。谁也弄不清究竟是美军攻来了，还是日本人在镇压游击队的暴动。几个富有的囚徒打赌争辩，押上了他们收藏的最后几盎司菲律宾烟叶和花生酱。

坦克兵的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四个目标：我们所在的比利比德监狱、圣托马斯大学内的一所较大的拘禁中心以及两所啤酒厂。在等待增援时，坦克开始围着这四个目标在内的四个街区绕圈。留在城里的日军只有一支骨干部队，他们集中在我们南面的西班牙古堡。这支骨干部队在最后关头得到已登陆的一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增援，这支部队的官兵是天皇的贵族亲戚。在援兵的鼓动下，日军做垂死的挣扎，在菲律宾贫民窟大肆奸淫屠杀。结果，除了渗透者所放的火以及掷弹筒投来的一些小炮弹，我们这个区域只有少量的战斗。几个街区之外有一个被摧毁的日本军火库正在燃烧，就像节日的焰火照亮了夜空。坦克在我们院子周围转来转去，发出单调的碾压声。我们仍然不能肯定那是美军。

接着，跟我们拘禁在一起的一名本格特公司的金矿工爬上楼来，趴在屋顶的护墙上窥探那些坦克究竟在干什么。当他站着观看时，两辆坦克停了下来，打开炮塔，让里面的人出来抽烟。一名驾驶员大声向同伴说了什么。那矿工爬下楼梯，讲了他的见闻。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传教士兴奋地对我说了这件事。她说：“嘿，凯西，咱们以前不是去过那条街吗？”于是我们明白赌注赔光了，收藏的最后那点食品可以吃掉了，那些坦克是美国的。

第二天早晨，负责管辖中国台湾省籍和朝鲜籍卫兵的日本军官提着机枪和燃烧弹来到我们的屋顶，准备在那里做最后的抵抗。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要求我父亲看住我们在无人居住的二楼残留的那点可怜的财产。卫兵的军官冲着坦克开了一阵枪，然后收到了从监狱门口发来的信号，说坦克兵已经同意日本人的条件：不伤害并释放全部战俘和被拘禁者，交换条件是美军允许他们乘吉普车撤出市区，与马尼拉以外的日军会合。接着，日本军官从屋顶下来了。他们发现我父亲独自一人坐在二楼楼梯顶端。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在大门口达成的协议，以为他们要出去送死，在路过二楼时很可能给

他一枪。在恐慌之中，他礼貌地说了句“萨哟那拉”（日语再见的音译）。第一个撤下去的军官扭头痛恨地瞪了他一眼。“愿早日在东京见到你们。”我父亲又快活地说道。第二个军官笑了，解开大衣，从内兜里掏出一些东西，把一瓶啤酒扔到我父亲膝头上。

日本人很快就撤出了楼房。我那茫然失神的父亲，身旁放满了半空的白兰地酒瓶和一瓶瓶啤酒——这是日本人对未来希望的象征。我们美国的坦克兵驱车把日本卫兵送到郊区，让他们在某处下车，菲律宾的游击队在那里等着将他们击倒。当时我并不为那些军官感到难过，但我很感谢他们那种官僚主义的作风。由于离计划的行刑时间还差二十四小时，他们让我们活了下来。

二十年后，我已获得达特茅斯与牛津大学的学位，有了在《生活》杂志工作十年的经验，正要写完我的第五本书——一部关于科学原理的著作。我的代理人告诉我，如果我能以日本文献为基础撰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方面的著作，威廉·摩罗出版公司的编辑是会很感兴趣的。

解开我在童年时代有关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困惑之谜，这种想法对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几乎花了一年时间在美国的图书馆研读。我再次学讲日语，仍然讲得蹩脚，而我第一次学习阅读日文——缓慢地阅读。我研读了十四万页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参考读物，研读了战后在东京审讯战争罪行时提出的五万页证词，还有缴获的三万页日本文件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接着，我带着妻子、四个孩子和二百七十二本参考书，住进了一所日式小房子，在这所房子里，我可以俯瞰日本故都京都的老帝国大学农学院的实验田。

1965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吃着用海菜卷裹的醋米饭团与生鱼片，桌子对面坐着一位退役的日本海军航空兵指挥官。他是既经历了对华战争又经历了对美战争而幸存下来的少数王牌飞行员之一。自从我几周前抵达日本后，我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日本除了建筑物的体积改变了以外，其余一切都毫无改变，因此我从内心不喜欢这个退役军官。他的半张脸被炸掉了，上面覆盖着紫疤组织。他态度温和，跟我讲英语。当他得知我曾在一所日本集中营里过了三十九个月时，他说他愿意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任何帮助，因为他的同胞“亏欠”了我。他告诉我，他俯冲轰炸过我孩提时代观看日本炮火时所在的两个山头。我们核对了日期，发现我可能在那两次都见过他的飞机从空中猛冲下来：一次在1938年，另一次在1941年。他甚至在关岛待过，而在那个地方，我的兄长，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去解放菲律宾集中营的途中，于

1944年死于日本机枪的扫射之下。

奇怪的是，我很快便跟这个从前的敌人交谈得相当起劲。虽然他的面部受过重伤，他却并无痛苦。对他而言，战争是职业，是竞赛。他引起了我的兴趣，给我介绍了几名退役的老将军，这些人对采访和讯问并不厌烦。对于日本的战场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思想，我算得上一个权威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被人牵着鼻子在听取一些关于日本英雄主义和战术天才的小故事。我既不厌烦那些故事，也不怀疑其真实性，但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趣闻逸事不会导致战争。我心头仍然萦绕着我童年时代的那个疑问：什么东西使得那些讨人喜欢的、聪睿而风雅的日本人投身于战争之中，并杀气腾腾地横扫了大半个亚洲？

我这个疑问的现成答案是军国主义，一种据说是由一小撮狡诈而野心勃勃的将军于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公众中唤起的群众性疯狂。我研究了我所采访的那些军人。他们多数人在战争结束时以中将军衔将结束了那场战争。他们全都是聪明人，军校毕业后又进了参谋学院，因而曾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神经中枢即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机关供职多年。他们都是热心的军事技术人员，对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提出了大量建议。他们当中没有人具备政治天赋。当他们感到自己无法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们便沉默不语：他们显得茫然若失，自称无知，或者显得有些调皮，以仍在执行的保密限制为借口。

偶尔他们会在无意中说出一些过去不为人所知的重大事实。例如，一名七十六岁的退役将军自豪地告诉我：1938年8月，他曾奉命负责设计空对地的通信，并拿到了对苏诺门坎战争的详细地形图。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场始于1939年5月的战争，仍被日本政府说成是一场自发的边界事件，他的上司曾在审判战争罪行时做证说，在“事件”爆发时，参谋本部的案卷中竟然找不到一张地图可以向他们显示诺门坎位于何处。

我说，我几乎不能相信，在1938年以前，陆军航空兵的大多数飞机上竟然没有无线电。将军能绝对记住那个日期吗？他在隔壁房间中的文件堆里翻找了一阵，然后得意扬扬地拿着一本日记返回。他给我看了记载着委派给他的任务的那篇日记。在我采访他时，有两名日本见证人在场，而采访结束时，我询问了那两个人，以确保我没有误解将军所说的话。他们向我担保我没有误解，但其中一人对我如此看重日期表示好奇。

那一周稍晚的时候，这位七十六岁的将军旅行五百多英里往返东京一趟，去见在日本现代自卫队担任顾问的一位年迈的同事。返回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弄错了，粗